

中古文学论丛 及其他

马自力 著

贼虽异等 出
无外物牵 遂此幽
雨夜来过 不知春
忽已曙 鸟雀绕舍
道人偶 或随樵夫
安塞劣 谁谓薄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古文学论丛及其他

马自力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 PET 常见错误精讲精练 = Common mistakes at PET and how to avoid them / (英)德里斯科 (Driscoll, L.) 编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05-5718-2

I. ①剑… II. ①德… III. ①英语—水平考试—自学参考资料 IV. ①H3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9321 号

版权登记: 陕版出图字 25—2008—201 号

This is a reprint (with annotations)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521-60084-4 Common Mistakes at PET... and how to avoid the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is reprint (with annotations)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is reprint (with annotation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reprint (with annotation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未经授权出口此版本属违法行为。未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书面同意,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被翻印或传播, 不得载入数据库或检索系统。

书 名 剑桥 PET 常见错误精讲精练
编 著 (英) Liz Driscoll
译 者 朱大伟
责任编辑 黄科丰 张 茜
封面设计 大愚设计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邮编: 710049)
电 话 (010)62605588 62605019(发行部) (029)82668315(总编室)
读者信箱 bj62605588@163.com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字 数 67 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5718-2/H·1587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服务热线: 010—62605166。

目 录

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	1
论中国古代清淡诗派的创作审美心态	17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清淡诗派批评	30
论陶渊明的咏史诗及其特征	42
论陶诗对后代山水诗的影响	53
试论唐太宗及贞观诗风	60
李白诗与妇人及酒	
——兼谈王安石评李白诗	76
论韦柳诗风	87
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	113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124
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	142
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	153
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	178
论中唐“郎官”与文学	212
中唐州郡官与贬谪题材文学的兴盛	250
中书舍人等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	297
历史与小说	
——对于小说观念发展的简要回顾	313

唐人笔记小说中的唐代女性	
——从资料与问题出发的初步考察	321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333
文学、文化、文明的横通与纵通	
——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349
文化的馈赠：关于国学教育和传播的思考	
——在“第十三届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70
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与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377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0）	389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1）	405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3）	421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4）	439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5）	456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6）	474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7）	488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8）	499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09）	512
后记	526

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
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①

这一首唐代韦应物的《幽居》，作于诗人辞官别秩闲居郊外之时。诗中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那早春细雨中的诗情画意，那达观通脱的人生态度，那古雅清淡的气韵风致，构成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士人心灵图卷。在中国诗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这类诗的作者也不乏其人；而在中国古代诗论家的心目中，这类作品和诗人则已被奉为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或规范。

这些诗人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历代诗评中，而且，传统诗论赋予他们的角色评价常常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以他们的始祖和总代表陶渊明而言，从他身后不久的梁代起，就有钟嵘在其《诗品》中追认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到了隋代，又有王通在《文中子中说》中封他为“放人”；宋人徐铉和葛立方更推他为“逸民”^②、

①（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

②（宋）徐铉：《送司桐庐序》，《徐公文集》卷24，《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集部，第132册，第165页。

“第一达磨”^①；而在清人吴淇、顾炎武、龚自珍的眼里，陶渊明又成了“圣贤之人”^②、“有志天下者”^③、“卧龙豪”^④。又如柳宗元，南宋刘克庄赞扬他复兴“雅道”，是“本色诗人”^⑤；而清人乔亿则指出他长于“哀怨”，视其为“骚人之苗裔”^⑥。此外，王维身兼“高人”^⑦、“卧龙”^⑧、“神仙侣”^⑨三任，张九龄、孟浩然、常建、储光羲、韦应物、梅尧臣、王士禛等，也分别被标上诸多名号。这种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诗论家们广泛注意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他们具有非他人能够比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至于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了上述诸多看似抵牾难合的角色评价。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诗评家们拈出，在某种审美尺度下被组合成一个凌跨几个朝代的诗人群，并由此对诗歌创作和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其例的。于是，其间奥秘，便很有深入探究一番的必要。

①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2，(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②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11，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292页。

③ (清)顾炎武：《菰中随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8册，第38页。

④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1页。

⑤ (宋)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6页。

⑥ (清)乔亿：《剑溪说诗》卷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页。

⑦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解闷十二首》其八：“不见高人王右丞。”《杜诗详注》卷1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6页。

⑧ (唐)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其一：“澄潭昔卧龙。”(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508页。

⑨ (明)李日华：《读右丞五言》：“紫禁神仙侣。”(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一、清淡诗派的角色特征

相互一致的角色特征，是清淡诗派成员走到一起的外在依据。

众所周知，屈原以他光耀千古的抒情长诗《离骚》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积极进取、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杜甫一生追求理想政治，批判黑暗现实，自称“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陆游虽自号放翁，却始终心系“扫胡尘”、“靖国难”，以至于到了晚年，仍然“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二月四日风雨大作》），他们堪称入世型诗人的代表。作为批判现实的诗人，他们虽然也曾行吟泽畔、筑堂花溪、僵卧荒村^①，但他们的行事与心态既不同于佯狂避世的楚狂接舆，又与自号华阳隐居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迥然相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富有这类诗人特有的浓烈感情外，更不乏政治家忧时悯世的胸襟怀抱。其角色特征在于“入世”二字。

与入世相对的自然就是出世。在中国封建社会，出世之人除了宗教徒而外，大量存在的恐怕就是被称为“幽人”、“逸民”的隐士了。从《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就专设隐逸传记载隐士行事。《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把隐士划为三种类型：

古之隐士，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

① 屈原遭谗被疏，流放江南，行吟泽畔，笑傲沧洲；杜甫辞官入蜀，卜居花溪，营建草堂；陆游被劾去职，归老故乡，有“僵卧荒村不自哀”的诗句。

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怵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①

在这里，第一类有德行而不受万乘之聘的隐士和第三类乐山林逃丘园不与世事的隐士比较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所谓“真隐”。比如许由闻尧欲让天下于己而到河边洗耳；庞公与其妻躬耕畎亩，不受官禄，后来采药入鹿门山，不知所终等等。至于第二类，严格地说，不能算作真正的隐士，他们或怀才不遇，或不合流俗，对于出处辞受，完全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所以，后来的史书隐逸传，就把这一类人排除在外，而专以终身不仕而又有世名当作划分隐士的标准了。总之，隐士的角色特征，在于“出世”二字。

较之入世型诗人屈原、杜甫、陆游等和出世的逸民隐士，以陶渊明为始祖和代表的诗人群自有其角色特征。他们与上述两类人在某些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入世型诗人比较，二者在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方面是一致的；但是，陶渊明等人在出处语默方面远远不如屈原、杜甫、陆游等那么执着，他们并没有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在他们看来，江海山林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在宦海沉浮与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心理平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江海山林势必将会成为他们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① 《新唐书》卷19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3—5594页。

与隐士逸民比较，二者在追求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方面是一致的；而其不同之处在于，隐士逸民既以此种人生态度处世生存，更以此种处世方式成名立身，因而他们可以被视为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的物化或象征，而陶渊明等人虽然把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但并不把它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在出处进退方面，陶渊明等人基本上持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但这并不排除发生在他们内心的激烈的冲突。这种内心冲突往往在相互对立的两极因素中展开，比如穷通、贵贱、荣枯、悲乐、自由与樊笼、纵浪大化与投身纷纭等等。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产生或仕或隐的现实抉择。对于隐士逸民来说，这种内心冲突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他们隐逸山林之前就已经消解；而对于陶渊明等人来说，这种冲突却时时伴随着他们的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入世还是归隐，都无法摆脱，从而他们吟咏性情、描绘自然的诗歌，便可视为其纷繁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清淡诗派形成的心理基础

在文学史上，每个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无不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自然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般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成立，除了一定的纲领宗旨、组织形式外，主要依靠相互认同这一心理基础；或者说只要有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学交往，就可以初步构成一个诗派或诗人群，如建安七子、江西诗派等。这样的诗派或诗人群，通常是成员共处于同一时代，其创作或开一代诗风，或被视为一代诗风的标志。

而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成员并不共处于一朝一世，也没有某种纲领宗旨、组织形式，他们的创作不被认为是开了一代诗风，或被视为某一代诗风的标志；他们所以构成一个诗人群，成为一种诗风的代表，主要是历史选择或历史认同的结果。如同他们分处于几个不同时代一样，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凌跨时代的，被视为中国诗歌审美理想的代表或标志。当然他们自身之间，也有着凌跨时代的相互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是相互认同和历史认同的统一。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尊古重史的传统。历史既可以是一种工具，可借以知兴替、明得失，把握事物盛衰之道；历史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可借以法先王、追前贤，标举某种理想人格及其生成化育的一切。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而深刻的。首先，它依靠的是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认同，这种理想人格从观念、情趣等方面对人们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对其产生一种奇特的情感共振，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其次，这种理想人格本身又是十分朦胧和含混的，作为理念与形象的结合体，它仿佛某种文学意象或意境，具有多义性，这就给人们的阐释留下了相当的空间。可以说，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独特机制——以复古为革新，托古以行其道。这种机制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便是学古与通变的统一。

陶渊明等人是典型的尊崇传统、对往古社会和先民有浓厚兴趣和感情的一群。在这方面，陶渊明具有无可争议的代表性。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几次出仕和归隐，无论是出还是处，他的诗中都不少了往古社会的氛围和怀古的情调。在他生命的调色板上，“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是两种相近而不可或缺的底

色。从某种角度来说，“遥遥望白云”甚至可以成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理底蕴。当他与邻人朋友来往时，是“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二首》其一）；当他独处衡门时，是“但恨殊世，邀不可追”（《时运》），“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萦系于怀、悠思难忘呢？且看他的内心独白：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
寤寐交挥。（《时运》）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其二十）^①

这是对先民任真自得的生活的追思：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其二）

道丧向千载，今朝斯复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其三）^②

这是对古道沦丧的叹惋：

① 以上三首，分别见（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1、卷1、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24、99页。

② 以上四首，分别见（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1、卷3、卷2、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77、46、88页。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①

这是对精神偶像的依恋；

愿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

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扇上画赞》）^②

这是对往古社会的追寻。

以上几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人格化的历史。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先师先民古道古书就是历史的表征，就是他理想寄托之所在。其对陶诗创作的影响，就是给他的诗作笼罩上一层往古社会自然淳朴的氛围，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理想人格的基调。这样一来，陶诗就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做到了学古与通变的统一。这是深层意义上的学古与通变，人们很难在一般的阅读活动中读出，只能沉潜到作品内部去体会。这是就陶渊明的一般诗作而言，至于他的拟古之作，如《拟古九首》，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一般

① 以上五首，分别见（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3、卷3、卷4、卷3、卷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84、131、107、123页。

② 以上二首，分别见（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8、177页。

的拟古之作，即使不标明所拟对象，人们也很容易找到摹拟的痕迹，从而确定所拟对象；而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却自然浑成，无迹可求。正如明人许学夷所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拟之迹。”^①清人方东树说得更加明白：“渊明《拟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②

“用古人格作自家诗”使陶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使陶渊明以及陶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朴素自然的往古社会和志趣高远的理想人格的象征。因而，陶渊明及其诗歌就被转换为一种历史传统，成为尚古心理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一点对清淡诗派的构成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尚古心理的作用下，一方面陶渊明以及陶诗成为清淡诗作者们的师承对象，这是他们进行历史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陶渊明以及陶诗又成为清淡诗作者们相互联系的中介和纽带，而这正是他们相互认同的心理基础。所以在清淡诗作者的笔下，怀古与拟陶之作往往交错出现，陶渊明和陶诗常常作为一种意象或情境进入他们咏史怀古的篇章。

这是一般的怀古诗句：

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张九龄：《叙怀二首》其一）

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王维：《辋川闲居》）

洗帻岂独古，濯缨良在兹。（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

士贤守孤贞，古来皆共难。（常建：《赠三侍御》）

①（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②（清）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摇摇世祀怨，伤古复兼秋。(储光羲：《登商丘》)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柳宗元：《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尝闻晋高士，时堰北窗风。(梅尧臣：《昼寝》)

历下亭中坐怀古，水西桥畔卧吹笙。(王士禛：《忆明湖》)

诗中只是体现了一种怀古的心态或情调，加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之后，此一心态或情调就有了实际的内容，并在对陶渊明人格认同的基础上，使诗的基调与吟咏内容形成一个浑然无间的整体：

自为本疏散，未始忘幽尚。……且泛篱下菊，还令邹中唱。
(张九龄：《九月九日登龙山》)

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王维：《送六舅归陆浑》)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孟浩然：《李氏园卧疾》)

去时能忆竹园游，来时莫忘桃园记。(储光羲：《酬李壶关奉使行县忆诸公》)

终罢斯结庐，慕陶终可庶。(韦应物：《东郊》)

当时陶渊明，篱下望亦久。(梅尧臣：《和江邻几有菊无酒》)

陶潜令彭泽，柴桑一舍耳。犹对匡庐山，共饮西江水。(王士禛：《彭泽雨泊有怀陶公》)

常建和柳宗元虽没有直接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入诗，但《空灵山应田雯》分明是常建笔下的桃花源，而柳宗元的《饮酒》诗

不仅深得陶诗之壶奥，而且“绝似渊明”^①。

但是，仅仅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入诗，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由于陶渊明人格的感召力和陶诗艺术的感染力，咏陶和拟陶之作历来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苏轼出于对陶诗的喜爱和对陶渊明的钦佩之情，就曾在贬谪惠州之时，做过和陶诗数首；但苏轼诗风显然与陶诗大相径庭。所以，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对陶诗的认同，除了受人格化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外，还存在着一个通变的问题。

通变的概念是与学古同时产生的。刘勰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旨在抵制“竞今疏古”之风，主张“还宗经诰”，即“明道”、“征圣”、“宗经”。但通变与复古不同，“通”指文学传统的先后继承，“变”指文学的不断发展，通变即探本求源，以达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文心雕龙·通变》）。可见，通变是以学古、通古为前提，以变为目的的。也就是说，通变虽然以变为主，但通却是其基调。由于通变的学古、通古色彩，后代诗论家在谈到“变”的问题时，往往强调“正变”，使之与通变对应。

如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②

“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有盛无衰”，可以说是诗论家们的理

① 《笔墨闲录》，转引自《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53页。

②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上》，《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碎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想。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识别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亦即确认传统和正宗；其次是创变而不失其正调，亦即诗评中常说的“某某得某某体格之正”。一旦被视为变调，就已超越出正变的范围了。

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正是学陶而不失正调的一群，他们继陶诗所开创的清淡诗风之后，从各自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清淡诗风的内涵。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云：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性之所近。^①

这是以陶渊明为始祖，认为唐人王、孟、储、韦、柳等从各自的品性出发，去挖掘陶诗的那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明人胡应麟更从“清”的角度，指出学陶各家的自身特点：张九龄清而淡，孟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②

以上仅就陶渊明在唐代的追随者而言，至于梅尧臣、王士禛，其诗仍然不离上述唐人师陶的轨道。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并序》评梅诗：“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③《宋史》本传也说梅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④从而梅诗特点可概括为清奇。而王

①（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卷上，《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碎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②（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③（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33，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7页。

④《宋史》卷44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